

钱澄之《藏山阁存稿》編集流传考述

汤 华 泉

《藏山阁存稿》二十卷，是明清之际重要作家钱澄之(1612—1693)的一部诗文集。钱澄之诗文作品数量很多，一生创作时间跨度很大，大抵可以四十岁的辛卯年亦即他从南明行朝北归的永历五年(清顺治八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此集的作品绝大多数属于前期。后期作品作者生前曾两次结集、刊刻，康熙元年有《田间集》十卷、康熙二十九年有《田间诗集》二十八卷、《田间文集》三十卷(此集前八卷有早期作品)，诸刻现皆有传本，情况较为清楚。前期作品作者也曾数次編集，其中部分作品也曾刊刻，但刻本除了一部同人集《过江诗略》外，其他皆已失传，作者晚年编成的《藏山阁存稿》只是靠传抄存世，未见有刻本。较之《田间诗文集》，《藏山阁》的編集、流传有些复杂，近代以来学人谈及此集及有关书目对它的著录都有一些模糊、误失之处，《文献》第二十一辑发表有陈祖武《钱澄之著述考略》，关于《藏山阁》亦所述不多。有必要对这些情况做一番清理、考察，这对钱澄之著作的整理、研究应当说是有意义的。

《藏山阁存稿》收诗十四卷，又以时序分《过江集》、《生还集》、《行朝集》、《失路吟》、《行脚诗》五个子集。《过江集》，二卷，起戊寅(明崇祯十一年)，止癸未(崇祯十六年)，作者后来在《生还集自叙》中说自戊寅之后“始能明体审声”，这是他最早的一批诗作。这些作品不少曾收入癸未年他与吴德操在南京编刻的桐城社友诗选《过

江诗略》，《过江集》即得名于此。据《生还集自叙》，作者此前作品有千首之多，《过江诗略》收钱澄之诗一百三十余首，《过江集》存诗一百七十余首，大多诗皆未保存。据《田间年谱》记载，作者二十九岁与友人在家乡课文时还合刻过《桐山汇业》，此集当有诗有文；三十岁作《移家白门纪事》长诗，友人孙克咸曾助刊于南京。这两个刻本皆未见流传，《桐山汇业》收诗不详，《移家白门纪事》今存《过江集》第一卷中。《生还集》，七卷，起甲申（崇祯十七年），止戊子（南明永历二年），是明清易代之际作者参加南明政治活动、参加反清斗争、入吴、入闽、入粤期间的作品。作者入粤后曾在广州编刻过《生还集》，事见《年谱》及《生还集自叙》，但较此书少一卷、上限晚一年。《自叙》云：“问道度岭，悉索敝簏，断自弘光元年乙酉，迄永历二年戊子冬止，约计四载，共得诗若干篇，为六卷，付诸剞劂。”之所以少一卷、晚一年，《自叙》说是乙酉三吴起兵前作品毁于震泽之难，《生还集》第一卷《咏史》题下注也有言及，作者当时行篋中无存稿，后来的有的据回忆、有的可能据别本补上了一年、几十首，而成为七卷。当年的《生还集》刻本，亦已不存，据《年谱》，其刻版作者在粤桂任职时曾随身携带，北归前寄存一士人家，不知下落。甲申、乙酉及前一年作者和同乡吴德操多次往嘉善与钱棨读书课诗、商讨国事，曾一度“闭户南园，日课诗一首”（见《年谱》），产生了不少唱和诗，今存《过江集》第二卷《南园杂咏同仲驭（钱棨）作》十首即是。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有钱棨《南园唱和诗集》，当为三人作品合集。此集今亦未见传本。《行朝集》，三卷，起己丑（永历三年），止庚寅（永历四年），为作者在永历朝中任职期间作品。这些作品之前未见編集，但其中有七十多首诗载入作者所撰的杂史《所知录》，占全部作品三分之一多，算是此集一个别本。《失路吟》，一卷，为庚寅至辛卯北归之作，少数作品亦入《所知录》。《行脚诗》，一卷，归里后次年作，編集于芜湖，芜湖友人曾为之板刻，事见《年谱》。《藏山阁存稿》收文六卷，依书疏、书疏、书、议论、杂文、杂文分卷，成集前未见别

有编刊。

从永历朝归来后，钱澄之对其早期作品很是注意保存，《藏山阁存稿》中的《生还集》第一组诗是《咏史》，题下有注云：“弘光元年避党祸作。是年诗几百篇、《咏史》二十首皆烬于震泽，闲居追忆，仅得此。”此云“闲居”，即指归里后，他在追忆中录存了一些佚诗。同时他觉得这些作品与时事颇多抵触，保存时又特别缜密，轻不示人，五十岁时编归来十年诗为《田间集》，之前的十年作品不入此集，这在《田间集自序》中借友人之口道出：“子游十年归，其十年诗既不肯传矣。”“不肯传”即不愿公之于世、板刻行世。以致每次出游，其子都要检查他的行篋，“文有一语犯时讳者，即藏弃”（《亡儿法祖生卒纪略》，《田间文集》卷三〇）。这些早年作和“犯时讳”的作品，他是单独保存，并不断进行整理的，如《上皖抚郑大中丞书》、《寓武水为家塞庵阁学复贝勒书》，文后都有编录自记，《生还集》第一卷中的《传疑诗》三首是归里几年后重过南京，从“先朝勋戚口中”得其始末补写的（见《所知录》例言）。《藏山阁存稿》的編集归里后在不断进行中，有些分集先编成，《行脚诗》即已成集，《生还集》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扩充，顺治十三年丙申之前亦即作者归里后四五年也已编成。丙申年作者在南京遇钱谦益，有《冬至夜同介丘友苍陪虞山翁礼塔即事》（《田间诗集》卷三），钱谦益将此诗及《生还集》中诗三十七首、《行脚诗》三十首录入《吾炙集》，《生还集》中诗分布在前三卷，次序全同后来《藏山阁存稿》中的《生还集》前三卷，可以证明扩充的《生还集》此前已经编定。但是此时《藏山阁存稿》全书并未编成，其编成应是在晚年，即在徐乾学弟兄资助他刊刻平生著作时。证据很明显：一，《藏山阁存稿》诗文都有一些归里后作品，最晚是《与汪辰初书》、《汪辰初文集序》，前篇作于七十岁、后篇作于七十三岁时。二，《藏山阁》的定名很晚，七十岁时与余仝庐商量刻诗文集，余建议分两种，“可行世者为存稿，余为藏稿”（《与余仝庐》，《田间尺牍》卷四），此“藏稿”即后来的《藏山阁存稿》。直到

徐乾学助刊其著作前《藏山阁存稿》才最后编成、定名，其时在与李醒斋一札中才明确提到“《藏山稿》二十卷”（见《田间尺牋》卷一），其友人也才提到这个集子的名称（见任塾《田间诗集序》）。

《藏山阁》编成后作者也曾谋求刊刻，而终未如愿。徐乾学弟兄先是助刊《田间易学》、《田间诗学》、《庄屈合诂》、《田间诗集》、《田间文集》五种成，因经费不继和语涉避讳，《藏山阁》未能同刻。二徐和作者都曾计划续刻，但就在此时，徐家出现重大的变故，康熙二十九年两江总督疏劾徐乾学的侄子、举人徐树本（道积）收贿、敲诈、贪污、横行乡里诸劣迹，徐树本之父徐元文革职罢归，次年七月忧惧而死。这年徐乾学也被革职，迭受严谴，直至三年后去世（以上见《清史稿》及《国朝先正事略》二徐本传）。在这样情况下，《藏山阁》之刻是不可能进行了。康熙三十年秋钱澄之亲至苏州已感到续刻无望了，他在《与家枚一》的信中说：“秋来再过吴门，拟竣拙刻未竟之工，不意时局大变，亦竟不能竣也。”（见《尺牋》卷二）这年钱澄之八十岁，再过二年钱澄之也就去世了，而徐家仍在祸患之中，可以肯定《藏山阁》是无法刻出。由于钱澄之在几封书信中都谈到了《藏山阁》刊刻的事，说了一些前后矛盾和模棱两可的话，被后人误认为此集已曾刊出，如萧穆《跋田间先生藏山阁集》（《敬孚类稿》卷七）、璚楼居士《藏山阁集跋》（见龙潭室排印本《藏山阁集》）、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关于《藏山阁》的提要都是这样认为的。诸人所持论据主要是见于《田间尺牋》中的两段话。一见《尺牋》卷一《与姜奉世》：“道积命卒《藏山阁》之刻，今已始事矣。”这封信是作者在刻成著作五种之后由苏州回到家乡的第二年春天写的，这几句话在抄本《田间先生书札》中是这样写的：“……尚有负道积承命卒《藏山阁》之刻，今已始事矣。”是说道积承其父命云云，这样的文字是正确的。他写这封信的缘由是听说徐元文罢职归里，继而卧疾，表示要前去看望，否则就对不起这位老朋友，特别是他那样关心《藏心阁》的刊刻。说“已始事”这是根据一年前情

况的推测，而非实知其事，及至秋天亲去苏州方知“时局大变”，拟竣之计划不能实现了。因此这几句话不能用来证明该书已刊刻。二见《尺牋》卷三《与休宁廖明府》：“以拙刻全部（按指刻成的五种）呈览。尚有一集，亦已授梓，……未免略涉避讳，不便印行，俟更续寄。”这是在前封信写过的第二年写的，也就是在徐家灾难深重的康熙三十一年写的，前已述过，这时徐家绝无可能助其刻书，说“尚有一集，亦已授梓”，不过是为了夤缘这位父母官而张大其词，这样的门面话也是不足为凭的。在这封信的前后，同时还有写给方受斯的两封信，一说刻成五种，一说刻成六种，可能是笔误。在钱澄之提到著作刊刻的所有书信中，大量的是“仅刻其五”的用语，同时的其他文献及后来所有清人书目也未曾见到有关于此书板刻的记录，所以萧穆虽推测此书“亦曾付梓”，但又说“未见人间藏有印本”，表示了疑问。

这部《存稿》钱澄之本人、家人及后人都严为藏弃，作者在世时很少有人看到这部书。看到其中部分作品的前面已提到有钱谦益，但他未见成书，以后朱彝尊可能看到，朱彝尊编《明诗综》收钱澄之作品三十首，有《藏山阁》中《秋兴》一首、《重过沈圣符村居》一首，小传也提到《藏山阁稿》。《明诗综》编成于康熙四十一年，已在钱澄之卒后。钱澄之在世和去世后有几种著名的总集收有钱澄之作品，如《明遗民诗》、《清诗铎》、《篋衍集》、《明诗别裁》，有的收钱澄之诗很多，《明遗民诗》多达一百二十多首，但都无《藏山阁》中诗，小传也未及此集。这部《存稿》似乎其乡后学如方苞、刘大櫟等人也未看到，方苞作《田间先生墓表》提到五种著作未及《藏山阁》，刘大櫟《历朝诗约选》收桐城人诗独取钱澄之，但未见取于《藏山阁》者。道咸间乡人编《枞阳诗选》、《桐旧集》皆以钱澄之为巨擘，但除自他集转录《存稿》诗一、二外，皆取自《田间诗集》。由于收藏深密，此集躲过了康乾之世严酷的文网。《田间诗文集》由于刊刻，流布较广，一再被禁毁，其书名列在《清代禁毁书目·清代禁书知见录》上，而在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所列禁毁书中,《田间诗集》、《田间文集》凡十六见,被禁毁的《田间诗集》三十八部,《文集》三十二部,还有一种是《所知录》,《藏山阁存稿》皆未见其名,显然未被发现。此书当时若被发现,酿祸之酷决不在《南山集》下。而《藏山阁集》璚楼居士跋谓萧幼孚(萧穆之子)所藏抄本《违碍书目》有《藏山阁集》名,刻本无。可能根据这条不确定的资料,孙殿起在《清代禁书知见录外编》中列入:“藏山阁诗存十四卷、文存六卷、尺牋四卷,光绪三十四年戊申龙潭室铅字排印本。”这是不正确的,也是很荒唐的,乾隆时禁书怎会殃及一百五十年后的清代末世呢。

《藏山阁存稿》原稿本今已不存,传抄本今尚见七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四部,藏所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清代别集总目》又著录三部,为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所藏(经查湖南图书馆无书);笔者又在钱澄之家乡访得其族裔所藏一部。这些藏本除上海图书馆藏本外,文字面貌大致相同。钱氏族裔藏本目录下署“云孙向阳葺录”,查《桐城钱氏宗谱》,钱澄之七世侄孙有名冬生字向阳者,此本当其所抄。《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著录有海盐朱氏藏旧抄本,谓“是书为其裔孙向阳葺录”,当为族裔藏本的过录本。浙江图书馆藏本书名著作《田间藏山阁》,原为嘉业堂藏本,湖南师大藏本书名著作《藏山阁存稿偶抄》,原为叶德辉藏本,有叶德辉跋。上海图书馆藏本有萧穆藏书印记,当为其所藏。据萧穆《跋田间先生藏山阁集》,此本得自钱澄之另一族裔白渠先生(钱彝)家。此本多出不少地名、名物注,间加史实、人物笺引,当为白渠先生所加。白渠先生为乾嘉间岁贡生,深熟经学,有著述。此本上朱墨圈点甚多,批语也有不少,据璚楼居士跋,这些又是萧穆所加,对照上海图书馆藏《敬孚类稿》稿本笔迹,批语确实全出于萧穆之手。

清代惟一印行的《藏山阁》就是光绪三十四年龙潭室铅字排印本,此本包括藏山阁诗存十四卷、文存六卷、尺牋四卷,书名页题桐

城萧氏抄本,卷首有歙县汪德渊、龙潭室主两序,书末附录有璚楼居士跋,卷端署龙潭室主、璚楼居士校刊。据诸书目著录,璚楼居士即汪德渊。安徽图书馆藏有此排印本的底本,据跋,知此本为汪德渊从萧穆家抄得,诗文即抄萧藏《藏山阁存稿》,尺牋亦抄其家藏本,抄成后“就商于龙潭室主,校付铅印”。这部排印本底本经与上图所藏萧本对照,萧氏评语大都保留,圈点也基本照旧,原本所加的笺注有不少删除。由于此本多抄了四卷尺牋,所以改原抄本统一编卷而为分集编卷,加上诗存、文存集名,又加上《藏山阁集》总书名。文六卷的分卷也与原抄本不同,分为书疏、书、书序、议论、论传记、杂文,作品的组合亦有改变,这样的改变不如原先合理。排印本即以此付印,但又删掉了全部批语和部分注文,圈点依旧。由此看来此排印本已经改变了萧氏抄本的原貌,不能称为萧氏抄本。但值得称道的是此本做了文字校勘,校语不少,这是原先所有的抄本没有的。也出现了一些误字,尺牋中的误字更多些。前面提到的《田间先生书札》,今藏上海图书馆,为不分卷的前清抄本,书札数量、次序正与此尺牋四卷相同,这为尺牋文字的校勘提供了难得的可能就是排印本所从出的本子。根据以上所述,知道了龙潭室铅字排印本《藏山阁集》的由来,它是在白渠先生家藏增注本的基础上、中经萧穆批点,最后由汪德渊抄录、改编、校勘、并合尺牋四卷而成。《藏山阁集》不同于《藏山阁存稿》,这在研读此书、著录此书时应当注意。

作者工作单位:安徽大学中文系